

林大川與《韓江記》

黃挺

汕頭大學

一、林大川

前幾年，淑彥兄的《潮汕人物辭典（文史藝術分冊）》¹出版，送了我一本。我嘗問他，為何未收《韓江》、《西湖》兩記的作者林大川？淑彥兄很厚道地一笑，回答，材料難找。

我知道淑彥兄講的是實話。儘管林大川只是百許年前的人，而我們對他的生平，已經不甚了了。現在所能看到的比較完整的介紹，是張國棟的《天井詩話》：

「林君大川，字利涉，號蓮舟，韓江佳士也。志在煙霞，情耽風雅，著述甚富，有《韓江》、《西湖》兩記行世；又有《續韓江記》、《釣月山房詩草》、《蠡測詩話》諸大作，雖未剞劂，已膾炙人口矣。」²

饒鏜先生在《潮州藝文志》裏引稱了上面一段話，又稍加補充，說：

「林蓮舟，同光間，海陽國學生，能詩，與同邑戴漉巾潛夫相唱和，時有韓江二布衣之目。」³

從上面兩則記載，我們可以約略知道：林大川是海陽人，進過太學。但國學生有六貢四監的不同，又有正途捐納的區別，林大川究竟由哪一條途徑進學？不清楚了。林大川詩文都寫得很漂亮，有好幾種著作。但這種才能並非國家所需要，所以他未做過官，饒先生書中稱他為「布衣」，「志在煙霞」則是更加委婉的說法。

另外，八卷本《韓江記》的第七卷中，有《甘露寺銘》一則。這則銘文的題刻，現在仍然保存在桑浦山甘露寺，落款為「林大銓」。蔡起賢老師說：

「甘露寺內石刻《甘露寺銘》，作者有的說是林大銓，有的說是林大全，應是石刻日久風化，字跡湮滅，或是後人填色有誤。」⁴

我到過甘露寺幾次，每次都要把石刻摩挲一番。石刻確已有些風化，字跡卻並沒有完全

湮滅；款字也有誤填的，而「銓」又清清楚楚地可以從刻痕中辨認出來。我想，林大川對自己的姓名，或者有「林大銓」的另一種署法。因為「川」、「銓」兩字，潮州話讀音特別接近，而用同音字或音近字做別名，于古于今，都不難找到例證。

《韓江記》裏還有一段記載，涉及到林大川的身世：

「『喜與皇家補袞，巧為游子縫衫』，此余老針鋪舊聯也。老鋪招牌「林俊髦」三字，非店號，乃余上六代祖諱也。俊髦公琢針，貨歸真實，利取零些，故近而川廣蘇杭，遠及南交各國，女惟俊髦針最合用，商惟俊髦針最易售。業傳七代，人養三房，凡百有餘口，一生食著不盡者，勤此為生計也。願我後人，不負厥祖，亦能貨歸真實，利取零些，不賣招牌，即為俊髦公之孝子賢孫矣。」⁵

於是我們對林大川又多了一點了解。他是潮州府城人，生長在一個世業工商的家庭，到他那一代，林家琢針已經有二百年的傳統，產品銷路極廣。去年在泉州，與海交史館的葉恩典兄神聊，問他，泉州人對潮州有何種印象？萬萬沒想到他首先提到的是針，說，潮州針好用，品種多，價錢平，許多老太太至今還嘖嘖稱讚不已呢。——這針，或許就是林家所出產。林大川已經進學，照時髦的說法，是個知識分子了。而他對自家的這份世業，猶關心有加，讀了上引那段文字最後幾句，誰都能夠體味出來。

讀了「針鋪」一節文字，忽然記起潮州掌故家黃梅岑先生。莫准他在著作裏談過林大川。將書一翻，果然如此。黃先生說，林大川乳名叫海泉，祖籍福建，先人移居潮州，傳到林大川已經9代。還說：

「他是八世祖業桂之弟業松的長子，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，逝世于光緒九年，年 53 歲。少讀書于小石獅巷一書塾。為人磊落豪爽，不圖功名，富同情心，時常資助貧困。」⁶

黃先生給這段文字取了個標題：「針鋪文人林大川」。這標題怪有意思的。開針鋪，工勤利薄，積數代之力，出個秀才已屬不易，入國子學，更難。林大川進了學，卻淡薄仕途，未曾有科名，方志的人物傳不提他。這也難怪。林大川精詩文，甚至能書法篆刻，然僅此，在修志的官紳們眼裏，一介「針鋪文人」而已，怎算得地方上的「人物」？

淑彥兄「材料難找」的苦衷於是乎生。不過，古今同揆，弄文舞墨者，大抵永遠也算不得個「人物」，要擺脫「莫予知」的尷尬，敢情最好是用手中弄熟了的筆，預留個「自編年譜」----- 玩笑話罷，諸君切勿認真。

二、《韓江記》與《續韓江記》

林大川勤於筆耕，一生「著述甚富」。其中最讓他滿意的，大概就是《韓江記》。在這本書的自序裏，他說：

「其構也精而賅，其措辭也簡而文；必篇整而格嚴，必句斟而字酌；欲信今而傳後，必考獻而徵文。雖不能重規而疊矩，卓而可以名家；諒不至獵秘搜奇，全然無裨于世。」⁷

然而，《韓江記》也像林大川本人一樣，並沒有得到纂修志書的官紳們的重視。光緒《海陽縣志 藝文略》記載了林大川的《釣月山房詩草》，卻未著錄《韓江記》。

最先著錄這本書的，是《潮州藝文志》。《潮州藝文志》說，「林氏大川《韓江記》八卷，存」，並用夾注指出張國棟《天井詩話》已經提到了它，又指出見存《韓江記》為「咸豐丁巳刊本」。此外，《潮州藝文志》又有「《續韓江記》，未見」一條記載，也說是據《天井詩話》著錄。⁸

細讀八卷本《韓江記》和上面引用過的《天井詩話》有關林大川及其著作那一段話，卻可

以發現，《潮州藝文志》關於《韓江記》和《續韓江記》的著錄似乎粗疏了一點。

首先，現存八卷本《韓江記》，並非咸豐七年丁巳（1857）刊刻的。因為在《韓江記》第七、八兩卷中，有不少條目，例如卷七「邑學」條記同治二年（1863）海陽縣學宮重修事，「金山書院」條記光緒六年（1880）方耀創建書院事，卷八「窖米」、「行籠」等條是光緒年間事，「甲子紀異」、「乙丑紀異」是同治年間事。寫作時間，都在咸豐七年以後。何況，七、八兩卷的卷目下面，都刻著「辛巳續刻」四個字。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，這兩卷書是辛巳年，也就是光緒七年（1881）才刻成。

其次，《天井詩話》同時提到《韓江記》和《續韓江記》，卻未曾將兩書的具體情況，諸如內容、卷數、刻印時間等講清楚，不免要給後人留下一些疑惑。

照我看來，儘管《天井詩話》是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成書的，但它介紹林大川及其作品的那段文字，應該在咸豐七年（1857）之後、光緒七年（1881）之前寫成。《天井詩話》所講的《韓江記》，不是我們今天所見的八卷本，而所謂《續韓江記》，應即八卷本《韓江記》的第七、八兩卷，並無單刻之本行世。

至少有兩個理由，可以支持我的推斷。第一，看《韓江記》的版本。《韓江記》與林大川的另一種行世作品《西湖記》，都是林氏釣月山房家刻本。將兩《記》的版刻風格稍作比較，可以發現，《西湖記》的行款、字體，與《韓江記》前六卷完全相同，而與《韓江記》後兩卷有較大的差別。我以為，《韓江記》的版本，至少有三個：第一個版本，是咸豐七年丁巳（1857）刊本。此本共六卷。字體較小而秀，與《西湖記》同出一手。這個版本刊行後，林氏又有續作，那就是《天井詩話》所提及的《續韓江記》。24年後，林氏將《續韓江記》編成兩卷刊版，與前刻六卷合為一書印行，沿用《韓江記》書名。這就是第二個版本，即光緒七年（1881）增補本。此本共八卷。增刻兩卷，字體較大而硬。第三個版本在民國壬戌年（1922）用增補本原版印

行，分裝 3 冊，每冊最後一頁添加「民國壬戌重刷」字樣和版權印記。《天井詩話》所提到的《韓江記》，是咸豐七年刊本。

第二，是《續韓江記》的寫作時間。八卷本《韓江記》的紀事，時間最後一條，為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二日⁹，則該書後兩卷的刊刻印行，大概要到這一年歲暮。這時，離林大川謝世，已經不足二年。縱使林氏仍然勉力續撰《韓江記》，恐怕也難成卷帙，更遑論行世且「膾炙人口」？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咸豐七年刊刻的六卷本《韓江記》，那麼，《續韓江記》的寫作，也就不存在時間方面的問題了。

《潮州藝文志》關於《韓江記》和《續韓江記》的著錄，現在依然被人襲用著。¹⁰因此，我不能不把這兩者的關係，認真地多講幾句。

三、《韓江記》的內容與史料價值

林大川作《韓江記》，是很有些史家抱負的。只要讀讀他在《韓江記序》中的夫子自道，就很清楚：

「國有史，一國之所繫焉。史之所或遺者，則有野乘稗官以承其乏。郡有郡志，一郡之所憑焉。志之所不能盡者，則有外紀餘書，以補其缺。此僕所由西湖作記于前，復輯著韓江于後也。」¹¹

他這種抱負，也得到學者們的認同。饒鐸先生的《潮州藝文志》，便把此書歸入史部地理類地方雜記之屬，加按語說：

「考《潮州府志》修于乾隆二十一年，自後未續修。蓮舟兩《記》所錄名勝古跡，雖多沿襲舊稱，而乾隆以後遺事逸聞，頗能旁稽備載，足補志乘之闕也。」¹²

林大川有意為方志補缺，《韓江記》的編次也頗有條理。第一卷記韓山。第二卷記韓江。第三、第四卷記郡城郊外，第五、第六卷記郡城城內，都自北起，而東，而南，至西而止。這前六卷，以地域為經，再緯以山川、名勝、古跡、井泉，舊聞、時事，人物、藝文。地方風俗物產，不單獨記載，但在敘事過程屢屢涉

及。後兩卷因為是補刻，編次稍亂。內容則大致相同，其間難免夾雜詭怪不經之談，就大體而言，基本上還是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自許那樣，「蓋記其實也」。

林大川用很生動的文筆，給我們勾劃出潮州的名勝風光，也給我們勾劃出清代道咸同光年間潮州的世相，使我們能夠真實地接觸到那個時代，接觸到那個時代的芸芸眾生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。

不妨舉些例子看看。卷五「云帆遺像」、「上諭」、「甲寅紀事」這幾條的內容，涉及咸豐四年(1854)潮陽陳娘康、海陽吳忠恕聚眾造反一事。這是 19 世紀潮州史最重大的社會事件。關於這一事件的始末，陳坤的《潮乘備采錄》、《粵東剿匪紀略》和長篇潮州歌冊《吳忠恕》都有詳細的記載。¹³陳氏二書所採取的，是官方的態度。歌冊所反映的，是民間社會的看法。《韓江記》所載雖稍簡略，卻表現了地方士大夫的立場，正好與上述兩類文獻相補充，使我們對這一事件，有多層次的了解。

《韓江記》多以潮州勝跡為題，行文中又常常信筆記下相關逸聞，雖寥寥數筆，卻讓我們窺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某個側面。例如卷四「台聯」條，記鳳凰台聯語，下筆卻講：

「道光初，知海陽事于學質，聽形家言四鄉械斗者，鳳台有礙也，樓閣微有所毀。毀後械鬥勢益熾。後郡守韓鳳修重為修復。」

把當時潮州械鬥的風氣，和地方官無力控制地方動蕩，只好乞靈於堪輿之術的無奈，活畫出來。同卷「東皋花園」條，講述宗人林橡芳仿廣州潘伍園林建東皋花園，後面帶出一個故事：

「自題『江山勝覽』四字，宴客其間。客見四字，便與借金五百。橡芳尋思，其殆有所挾而求也，頓悟四字犯晦，改『江』為『湖』。明日復宴之。客一見無處啟齒，不待席終，喪氣而返。」

在這個小故事中，我們不難感受到當時文網之密，人情之薄，和志書中屢屢提及的潮人「健訟」的風氣。

其它，像卷五「丁巳紀事」條輯錄潮州的米荒與糧價，上文引用過的「針鋪」條記述作者家族的工商傳統與為商之道，都是很有用的經濟史料。

卷七「藍烈婦」條，立意雖不免迂腐，卻很具體地勾勒出早期潮僑的生活圖景：

「烈婦藍氏珍娘，澄邑林某之妻。就婚數月，夫因家貧遠適暹邦，婦針黹自勞。咸豐五年仲夏，某受親戚寄托資，自暹還。道遇賊，財被搶一空，垂涕而歸。藍氏詰問，某述其由，且勸改適。氏曰：『若欲改適，匪自今矣，何勞勸焉！』于是執繩並經而死。」

潮人過番的因由，僑眷在鄉的生活，水客制度，都可管窺一斑。同卷「節婦」條，卷八「搭蟲習歌」條，也都是有足取資華僑史料。

然而，林大川畢竟是文人而非史家，《韓江記》對詩文聯語搜羅宏博，可以看出作者興趣所在。鍾聲和給《韓江記》作《序》，用了很漂亮的文章讚嘆道：

「丁巳之春，出其所輯《韓江記》，囑予點定。予三復吟誦，嘆其卷帙不繁，而當代名篇，前賢妙句，未始不悉備其中。生本探奇之妙手，抒闡幽之雅懷。遂使隱士孤吟，不隨秋花俱謝；名公片羽，可借宋艷並傳。是何異璞隱荊山，遇卞和而瑜著；劍埋豐邑，逢雷煥而光騰也。」¹⁴

實在把這一點看得很透。《韓江記》對宋明以後潮州詩歌、聯語搜羅宏富，作者自己和同時代文人的作品所佔分量最大。加上創作場景氛圍的介紹，作品優劣的點評，書中好些條目，完全可以作詩話讀。治潮汕文學史，這部書也是決不能忽略的史料。

至如卷五「靈毛」、卷六「城南書莊」、「吾心堂」、「雨亭居士」諸條，有意治潮汕藝術史者，至切勿輕易放過。

1998年5月，初稿於桑浦山麓宿舍；

2001年1月，修改於金濤莊寓所。

注釋

¹ 孫淑彥、王雲昌編《潮汕人物辭典（文史藝術分冊）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1）。

² 張國棟，字云生，潮陽人。《天井詩話》未見。引文從《潮州藝文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），第204頁轉錄。

³ 饒鏜、饒宗頤《潮州藝文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204。光緒《海陽縣志藝文略》《釣月山房詩草》條案語說「大川，號蓮舟，國學生」，大概就是饒氏所本。

⁴ 蔡起賢：《甘露寺考實》，載《潮汕文化百期選》（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內部印行，1997）頁87。

⁵ 《韓江記》卷五「針鋪」條，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重刷釣月山房刻本，後面引用《韓江記》皆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⁶ 黃梅岑《潮州街道掌故》（廣州：廣東旅游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22。

⁷、¹¹ 林大川《韓江記序》，見《韓江記》卷首。

⁸ 《潮州藝文志》，同上版本，頁202 - 203。

⁹ 《韓江記》卷八「行龍」條按語。

¹⁰ 例如廣東中山圖書館、汕頭圖書館學會編寫的《潮汕文獻書目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4）對《續韓江記》的著錄。

¹² 《潮州藝文志》，同上版本，頁204。

¹³ 陳坤，字子厚，錢塘人。咸豐四年潮州亂，陳坤為海陽縣丞，親與彈壓。《潮乘備采錄》所記為陳氏親歷事，有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廣州萃經堂刻本。《粵東剿匪紀略》依據官方文檔抄摘輯錄，同治十年（1871）廣州藝苑樓刻行，原刻未見，《中國野史集成》編委會、四川大學圖書館編《中國野史集成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）第42冊有油印本。潮州歌冊《吳忠恕》，不具作者姓名，潮州李萬利刻本，時間不明。

¹⁴ 鍾聲和：《序》，見《韓江記》卷首。